

# 從布迪厄的紀錄片看法國社會學家的 社會參與： 兼論法蘭西文化深度與「知識份子」

黃敏原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 一、楔子

2001年5月2日，巴黎的MK2電影院<sup>1</sup>上映了一部名為《社會學是種戰鬥的運動》（La sociologie est un sport de combat）的影片，它是由紀錄片導演 Pierre Carles 跟隨著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三年（1998-2001）時間，將這位學者日常生活中學術活動、教課、演講與參與社會運動的種種事蹟描繪在這部長達 146 分鐘的影片中。片中整理了許多訪問布迪厄的橋段、布氏在這三年間所舉行的學術演講以及他關心社會問題的實際所言所行。

嚴格地來說，這部電影並不易懂，因為導演在片中保留很多布迪厄講述學問時的實際論述，甚至是推論過程。所以就一般的觀眾而言，雖然可以在這部充實的電影中上一堂「社會學概論」的課，或者瞭解「布迪厄其人、及其思想與社會參與」等內容。但是過於學術性的思想與言論，相信即使是法文作為母語、習慣享受在文化、歷史與思想性極高的紀錄片中的巴黎市民觀眾，都不是一盤清淡的小菜。其不清淡，除了本片蘊含的思想內容之外，社會學作為一門抗爭性強烈的學科，其先天的屬性也帶給人「社會的守門員」、「抗爭的領航者」式的責任性、倫理性極重的感受。然而，這樣一部分量如此之重的影片，卻在巴黎街頭放映了長達數年之久，<sup>2</sup>

<sup>1</sup> 「MK2」電影院乃由 Marin Karmitz 於 1974 年創設，現為法國境內連鎖電影院，而座落在龐畢度中心（Centre Georges-Pompidou）對面的這家，名為「MK2 Beaubourg」，設立於 1981 年，放映的電影不以暢銷、好萊塢片為主，而以播放藝術電影、紀錄片、第三世界電影聞名。一般稱為「un cinéma d'art et essai」。

<sup>2</sup> 電影下片之後，該片由「C-P Productions et VF Films」出版 DVD，於 2007 年 12 月於市面上銷售。





這不僅顯示出 MK2 主事者的文化理念與經營勇氣；同時也透露出巴黎人藝文消費的深度。作為一個臺灣出生、長大、學術養成的筆者，在觀察到這個社會文化現象之餘，覺得有意義的還在於，如果「這樣」的片子在臺灣的臺北播放，它可以上映多久呢？<sup>3</sup> 它的票房會如何呢？<sup>4</sup> 為什麼呢？以此，本文除了引介這一部電影之外，也寓含有反省性地觀察法國學術現象、社會現象，並進而批判式檢討臺灣相關領域的發展與特徵的意圖。藉此讓我們有機會對臺灣的學術／文藝現象加以思考。

而順著對這部影片的介紹與分析，本文亦想觀察法國這種「社會參與型知識份子」(intellectuel engagé) 在社會中介入的方式，以及人民對他們這些作為的觀感與評價。關於法國社會對布迪厄這樣的社會學家的整體評價，本文將參照其殞落之後文化媒體界對於他的憑弔、紀念與總體的回顧，藉此揣測法國社會對這種戰鬥型思想家的定位與肯定。當然，本文也希望藉由這些「學術／文化／社會（媒體）」三元的觀察，回過頭來反身思考臺灣社會對相關人事的作法。

## 二、布迪厄社會學的實踐意義： 法國脈絡的知識份子

這部長度近兩個小時半的紀錄片，集錦了布迪厄於 1998 年至 2001 年三年內幾項代表性的學術工作：在法蘭西學院 (Collège

<sup>3</sup> 當然放回臺灣的時空脈絡，放映的片子裡的主角也應該改成臺灣學術界、文藝界之泰斗或重量級人物。不過這個提問的假設，仍舊是紀錄片、仍舊帶有社會教育以及社會關懷的屬性。

<sup>4</sup> 官方數據指出本片的票房為「87305」，不過筆者懷疑實際人次更多。

de France)<sup>5</sup> 講課、到美國芝加哥大學演講、到巴塞隆納介紹新書與接受訪問、與德國文學家格拉斯<sup>6</sup> 對談、在巴黎高等社會科學院 (EHESS de Paris)<sup>7</sup> 上課、在其研究室工作以及與研究中心的同仁討論研究事宜、參與社會運動，以及與郊區弱勢的社會團體成員進行所謂「知識份子式的對話」(débat intellectuel)。我們可以在整部片中看到布氏如何解釋他生平中的重要學術概念、也可以看到他跟周遭的人的應對進退之舉手投足；更重要的，是觀察到他從八〇年代起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的精神與實踐。以下，我們透過整理幾段布迪厄在本片中的實際言行內容，來探討從這部紀錄片所呈顯出來的布迪厄社會學的特徵。

(一) 社會實踐一：回應[電台]媒體的訪問作為一種  
「社會參與」與「社會教育」

影片中有一段頗完整的段落是拍攝布迪厄前往巴黎西方「Mantes-la-Jolie」城接受電台 RDC (Radio Droit de Cité) 的訪問。<sup>8</sup>

<sup>5</sup> 布迪厄在法蘭西學院講課的時間段為：1981-2001 年，其講座的學科名稱即為「社會學」(sociologie)。在法蘭西學院講授「社會學」相關課程之前兩位法國思想家則為牟斯 (Marcel Mauss, 1872-1950) 與阿宏 (Raymond Aron, 1905-1983)，分別是 1931-1942 的「社會學」與 1970-1978 的「現代文明之社會學」(Sociologie de la civilisation moderne)。

<sup>6</sup> 格拉斯 (Günter W. Grass, 1927-) 是 1999 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布迪厄於 1999 年 12 月 5 日在瑞士的 Neuchâtel 與之對談。

<sup>7</sup> 此校全名之法文為「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 Sociale」，乃布迪厄一生中主要服務的學校 (1964-2001)，當初於 1950 年由年鑑學派史學家 (F. Braudel) 積極成立「文化研究」(«aires culturelles») 的發展方向，並於 1974 年從「巴黎高等實踐學院」(l'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獨立出來。影片中此校還座落在巴黎第六區之 Raspail 大道 (Bd. Raspail) 上，現已移至十三區。

<sup>8</sup> 訪問時間是在 1999 年 12 月間。





節目一開始，主持人即詢問布迪厄三大問題：「何為社會學家？布迪厄你在做些什麼？以及社會學家對社會有什麼用處？」布迪厄的回答方式，先從一個字典式的定義來解釋何為社會學，他回答：「社會學是一門研究人們社會現象的學科。」（*Sociologie est une scientifique des phénomènes sociaux chez les humains*）。不過，他也隨即指出這種套套邏輯式的定義，根本沒有交代什麼。而他真正介紹社會學的策略，則是從解釋社會中的不平等現象之所以成為目前這個情形的原因說起。他指出社會學家旨在找尋出一條社會上的法則（loi），這是一條不平等之所以形成的背後邏輯，也就是「社會的再生產」（*reproduction sociale*）的背後其實有一些規則可以被發掘。要如何去瞭解「社會分類」（*classification sociale*）背後的原因呢？要怎麼深入解釋為何富有人子弟總有好日子過呢？這裡他提到了代間傳遞的觀念，如資本的傳遞（*transmission du capital*）。然而必須強調的是，這裡的資本指的不只是經濟資本，而是布迪厄特有的概念：「文化資本」（*capital culturel*）。

面對這個對社會大眾而言稍嫌艱難的字語，布迪厄使用了「語言」來做解釋。雖然在法國每個人都會講法文，不過誰能講出一口好的法文，卻才能在學術市場上吃得開，也才有其價值！是故，布氏指出文化資本其實是一種稀少的資源（*resource rare*），而且在社會上的分配也是不平等的，也正因為社會上有著這種分配資源上的差異、使用法文的腔調、優雅度的差異，才使得社會學更能彰顯其分析的力道。<sup>9</sup> 而布氏亦斷言，社會不平等的再生產，在現在社會

<sup>9</sup> 這裡我們看到了布迪厄用了「秀異」（*distinction*）的概念。而造成這種文化資本獲得上的差異，布迪厄確實在《秀異：評價的社會批判》一書開宗明義提到兩個重要的影響因素：此即（學校）教育程度（*niveau d'instruction*）與社會背景（*origine sociale*）（即：家庭環境、家學）。見 Bourdieu（1979）*La distinction. 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中越來越透過文化資本的差異性傳遞所造成，在美國的現象還比在法國的現象要嚴重。

在上述的訪問中，我們可以觀察到布迪厄接受媒體訪問，以及認真介紹社會學的內容、社會學的任務的誠懇態度。從這些對話當中，我們一方面可以看到法國媒體記者詢問專家學者時的專業度、以及他們與演講者溝通時對於相關知識的掌握與理解深度，他們的提問方式以及回應時的反應都有一定的水準；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布迪厄作為一個理論性、抽象性極強的學者，卻也願意主動地、很當一回事地向社會一般聽眾介紹、解釋這些學術名詞與概念：這種嘗試用較為淺顯的例子，來向社會大眾介紹原本複雜、抽象的概念與知識的動作，背後隱含有「社會參與」與「社會教化」的理念。

## （二）社會實踐二：在不同場合與各種人的互動

另外，我們在這部影片中也見到「南征北討」的布迪厄：遠到美國芝加哥大學做學術演講、前往巴塞隆納的受訪並介紹他的新書《男性宰制》(domination masculine)、<sup>10</sup> 去瑞士與德國文學家對談等等。

在記錄布迪厄前往美國芝加哥大學演講的時候，導演並沒有特別播放出布氏在該場演講中的學術內容，卻頑皮地拍攝了一段「幕後花絮」：在布迪厄演講完之後所吐的苦水。他個人覺得用英文演講真是「恐怖」(C'est terrible)，在整個演講完他的嘴是乾的，若用法文來演講將不是如此。另外在巴塞隆納的新書發表會中，布迪厄於會後接受訪問，除了訪問了關於《男性宰制》一書的內容與論述之外，也針對他的身世進行訪問。訪問者詢問他為何想做這樣的

<sup>10</sup> 法文版為 1998 年 9 月頭版，由「Seuil」出版社出版。西班牙文版本則在 2000 年譯出。





研究、也在最後請教他關於這樣的性別關係能否有改善的可能。布迪厄在此的回答傾向於謹慎，對他而言社會學家與其給出一個希望（*espoir*），不如交代出一條法則（*loi*），當然他仍舊相信社會是會有所改變的，不過作為一個觀察社會以及分析社會的學者，這裡的立場卻與韋伯（M. Weber）的「免於價值涉入」（*Wertfrei*）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在接連幾次的受訪中，我們看到布迪厄面對訪問者的態度，雖然訪問者不見得受有專業的社會科學訓練，但是布氏認真地介紹他社會學思想、觀念的心態卻非常一致。在他口中與肢體語言所呈現出來的社會學知識，並非玄之又玄的「哲學」，而是不僅可以與我們的社會生活相連結，也是可以用來幫助我們瞭解這個社會、進而改造這個社會的重要工具，布氏這樣的精神理念可謂貫穿整部影片。在這影片中的社會學概念，雖然仍舊「高深」或者「專業」，但是它並非「曲高和寡」，也非「與世無爭」，更非象牙塔的一門學問。這使得原本就熟知布迪厄社會學思想的我們，在看完影片之後會有一股恍然大悟的感受，尤其經由英文世界的翻譯與引介，這些法國思維才來到臺灣本島的學術既受（*reception*）方向與過程，讓我們除非到法國去、深入到整個時空學術脈絡中進行吸收與熟悉，否則將容易把布迪厄去頭去尾、斷時斷空以及去脈絡化地學舌著那些陌生的、拗口的學術名詞、概念與書名。

另外，影片中也有幾個片段，捕捉到訪問者詢問布迪厄的求學過程：他所出生的小鎮、<sup>11</sup> 在家鄉附近就讀的高中<sup>12</sup> 得到了獎學金、來到巴黎就讀高等師範學院（*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sup>13</sup> 畢

<sup>11</sup> 布迪厄出生在「大西洋—庇里牛斯」（*Pyrénées-Atlantiques*）省、「*Denguin*」地區的一個小鎮：「*Béarn*」。

<sup>12</sup> 布迪厄就讀的中學是「*Lycée de Pau*」（1941-1947）。

<sup>13</sup> 布迪厄於 1951-1954 年學籍在高等師範學院。

業之後到阿爾及利亞服役；詢問他父親的工作<sup>14</sup>、詢問他為何要讀社會學。而布迪厄也在一次的回答中透露，當他從外省來到巴黎就讀的時候，就深深感受到外省人法文的腔調與巴黎地區的人大不相同。當他習慣了巴黎地區的口音之後，在多年後聽到自己家鄉的人講的法語腔調，卻又厭惡難耐。<sup>15</sup> 這裡呈現出布迪厄作為一個「外省人」(Provinçial) 進到首都的菁英環境之後的社會觀察，以及其特有成長歷程對他社會學思考的影響。

而總的來看影片裡布迪厄在各式各樣的場合中，與不同國籍、身分、背景的人對談、被訪問以及解釋他的思維，我們亦不難看到布氏「社會實踐」的諸多向度。而這種社會實踐的動力與精神，最大的彰顯則是呈現在本片的最後一個場景：布迪厄與社會弱勢團體所進行的「知識份子式的對話」。

### (三) 社會實踐三：「知識份子式的對話」與布迪厄社會運動的立場與態度

在影片的最後，導演放置了一段長達二十分鐘的座談，是布迪厄前往社會抗爭所在地與當地弱勢民眾一起思考他們的處境與出路。布氏受邀來到會場與數百、上千人次的社區居民共同思考，進行的討論主題是不平等的再生產以及應當如何解決這樣的社會不公平。於會場上，當地年輕人提出他們的宿命感，悲觀地認為社會上失業的擴大，但是媒體在這個過程中只是利用這個社會現象做報導，並沒有真的報導出癥結、報導出人民的苦難；更不說提及解決

<sup>14</sup> 根據布迪厄的口述，他父親一開始是為農夫、後來當過郵差以及一些小公務員。

<sup>15</sup> 這個部分布迪厄在提到文化資本時承認，當他聽到那些腔調特別重的法文，他「真希望把他們殺死」(J'ai envie de le tuer)。







之道。他們也瞭解這個不平等的命運來自代間的傳遞，但是卻不認為能有什麼改善的可能性。

會場主持人大聲疾呼，提議首先不要對前來一起討論事務的學者專家懷有敵意，因為這些學者來到會場中是要與民眾站在同一陣線，進行一個「知識份子式的對話」(débat intellectuel)，但希望大家不要把這種對話看待成「貶義的」(péjoratif)，而是一種大家一同來反思的有意義舉措。不過，在台下鼓譟的社區居民們卻對來訪的學者抱著紛雜的態度與想法。由於長久以來的不平等社會結構已經使他們灰心、失望甚至是憤怒，有人提出「布迪厄也不是神」，<sup>16</sup>不認為因為幾位學者的到場就能拯救他們的惡劣處境。甚至還有一位居民以懷疑的口吻提出，為何每次社會運動的時刻，政府介入的處遇中總會看到有社會學家參與在其中，社會學家彷彿就像是「郊區的精神分析師」<sup>17</sup>(psychiatre de banlieue)成為政府處理社會運動的打手。布迪厄則對於這種「精神分析師說」反應相當大，他直指這種稱謂是一種侮辱(c'est insultant!)，他指出，或者真的有這種社會學家，不過社會學的面向相當多元、社會學家也有很多種類型。他認為如果社會學的想法可以對政策的制訂有所啟發或貢獻，這當然相當美。不過他個人的立場是一定站在民眾這邊，聲援著他們。

<sup>16</sup> 這句話的法文是：「Bourdieu n'est pas Dieu」，布迪厄這個字的後半部分法文發音，正巧與「上帝」(Dieu)是一樣的。說話者這樣說出來的時候，現場造成了開玩笑甚至是戲謔布迪厄的效果。不過這位年輕人並非侮辱性地冒犯布氏。在紀錄片最後散場的時候，他還特地來向布迪厄道歉。

<sup>17</sup> 這位市民的說法，應該是質疑社會學家作為「御用學者」專門出來將郊區的暴動、社會運動進行精神分析，指出郊區居民在心理上的疾病，以此就能結案。

再一次，布迪厄利用這次的溝通，他強調當我們看到社會不平等的現況時，現象本身或者是令人悲觀的；不過在結論上，這個情況卻又是可改變的。這裡呈顯布迪厄看待社會運動的態度與盼望。他的社會學研究與關懷這社會緊緊扣連，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在他的身上沒有斷裂，固然這也是展現出他學術的社會使命以及作為學者他的社會實踐跟社會參與。走出會場之後，他繼續表達他的個人看法，面對社會運動，他並不討論郊區的暴動中該不該火燒車。因為「我們可以去燒車，但要知道目地在哪裡！」（on peut brûler la voiture, il faut avoir un objectif）

### 三、從紀錄片播放到布迪厄辭世： 社會反應及其意義

在這部紀錄片上映之後不到一年的時間，<sup>18</sup> 布迪厄的逝世消息即已傳出。<sup>19</sup> 巴黎街頭上的三大報<sup>20</sup> 紛紛以頭條來報導這位偉大「知識份子」的離開。而左派第一大報《解放報》更是以最前面的六個版面來報導這則新聞，並特意將第一頁的全版面完全空出，一張偌大的布迪厄肖像佔據了報紙的一半，英俊年輕的社會學家臉龐一旁，簡要幾句描述：

<sup>18</sup> 影片上映是：2001/05/02，布迪厄辭世乃：2002/01/23。

<sup>19</sup> 即使影片主角辭世，這部紀錄片仍繼續在巴黎電影院播放。票房沒有因此突然飆高，但也沒有明顯下降，就這樣又在 MK2 播放了幾年，除了場次漸次減少之外，布迪厄的死與其紀錄片的票房幾乎是獨立的兩個社會事實。這是巴黎人的文化消費模式，此即不會一窩風地消費死者的文化遺物。

<sup>20</sup> 此即《世界報》（le Monde）、《解放報》（la Libération）與《費加洛報》（le Figaro）。





## 布迪厄

場域的支持者

社會運動的陪伴者

《世界的悲慘》的作者

社會學家星期三辭世

享年七十一歲<sup>21</sup>

翻開報紙的第二、三版面，映入眼簾的是顯眼八、九十號字體的抬頭：「皮耶爾·布迪厄：戰鬥社會學家去世」(Pierre Bourdieu: mort d'un sociologue de combat)。裡面除了介紹布迪厄晚年積極參與的社會運動之外，也提到了其實社會學界前輩涂爾幹早在一個世紀前即已建立了社會學這門學科的反思性典範 (un savoir réflexif) 以及其對社會實際分析的貢獻：社會實踐與社會參與。另外，報紙用「投入的知識份子」<sup>22</sup> (intellectual engagé) 來形容布氏，是同時比對六、七〇年代另外幾位重要的法國知識份子，如沙特與傅

<sup>21</sup> 原文則為：「Bourdieu, les champs du partisan. Accompagnateur des mouvements sociaux, le sociologue, auteur de « Misère du monde » est mort mercredi à 71 ans.」

<sup>22</sup> 報紙上另外也用其他同義詞來形容布迪厄社會參與的行徑：「學術上的戰鬥主義者」(militantisme scientifique)、「實際參與的知識份子」(intelletuel d'intervention)。這些詞也都顯示出法國定義「知識份子」(intelletuel) 的特定期待：社會參與。「militant」與「militantisme」這兩個法文字，雖然字根有「軍事」的意涵，不過這裡具有「社會運動」等積極參與性、實際活動性的內容。陳宗文則將之翻譯成「鬥士(型)」(見：陳逸淳(譯)(2012)《所述之言：布赫迪厄反思社會學文集》(Choses dites)，Pierre Bourdieu 著，臺北麥田，〈導讀〉部分)

柯在運動界的付出。一條系譜不只是從二十世紀初的涂爾幹接到六〇年代學運時期的沙特、傅柯而已，而是在報紙第二版的下方，我們赫然發現這時候最重要的政界人物，亦一一表達他們的評價與憑弔：當時的右派總統席哈克（J. Chirac）、左派總理喬斯班（L. Jospin）以及那時候在抬面上數一數二的重量級政治人物，都表示他們對於這位偉大思想家的理解、肯定與尊敬。<sup>23</sup>

第四、五、六頁的版面中，則分別用了「社會學場域」（champ sociologique）、「媒體的場域」（champ médiatique）、「社會的場域」（champ social）與「政治的場域」（champ politique）來介紹布迪厄在這幾個面向的表現。除了介紹布氏在學界的生平、以及種種學術研究中的主題與社會關懷之外，專欄記者也探討著為何 1995 年關於與媒體之間的大辯論中，布迪厄這位批判媒體的思想家可以在公眾辯論中備受矚目？除了布迪厄享有的社會頭銜（巴黎高等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指導教授、法蘭西學院講座教授、「歐洲社會學研究中心」<sup>24</sup>

<sup>23</sup> 筆者當時一位正準備攻考高師的法籍友人，看到報紙上席哈克等人的言論，噴飯問道：「可是席哈克真的懂布迪厄嗎？」不過，筆者將這個內容陳述出來，卻還有另一個用意：思考法國學界、文藝界的泰斗去世的時候，整個社會給予的是怎樣的「待遇」，對他們進行的是如何程度的紀念或感懷。而相較於在臺灣，同等級的或具同等貢獻的文化人、學術人辭世時，臺灣社會又是怎樣報導、對待、緬懷以及感謝這個人一生中在這個社會的貢獻？

<sup>24</sup> 「歐洲社會學研究中心」（Centre de sociologie européenne）原為 R. Aron 於 1959 年成立，布迪厄於 1960 年擔任他助理的時候，被委派為該中心秘書一職。但 1968 年學運後布氏與阿宏分道揚鑣，布氏另外創立了「教育與文化社會學研究中心」（Centre de Sociologie de l'éducation et de la culture）。到了 1985 年，布迪厄亦成為「歐洲社會學研究中心」的主任，而直到 1997 年應法國國科會（CNRS）之要求，兩個中心才被合併成今日的「歐洲社會學研究中心」。這個中心的研究發展方向，與布迪厄有著很大的關連。





主任、《社會科學的行動研究》<sup>25</sup> 創刊兼主編) 之外, 他從早期主編的學術刊物<sup>26</sup> 到他透過研究、刊物、研究中心所兜攏的同儕、人力資源, 都使他那種社會實踐的理念不僅能夠適時適處發揮, 也在社會上造成了效果, 並喚醒了整個社會來反思他所顧慮擔憂的。1995 年 11、12 月間的社會運動中, 布迪厄挺身出來支持這些街頭罷工者, 也利用這次的局勢成立了一個出版社, 名為「行動理由(性)」(*Raison d'agir*)<sup>27</sup>, 這個出版社的出書計畫卻不是被定位在純學術性研究 (*recherche*), 同時也是對社會積極參與的 (*militant*)。這個集結了三十幾個與布氏理念相合的學者們, 願意與原布迪厄所創的「教育與文化社會學研究中心」串連, 並在社會問題的解析與社會參與上做出貢獻。

就在第六頁的版面最下方, 我們也注意到「解放報」放置了一位社會學家對他的悼念與評語, 那是一同在高等社科院教授社會學, 一生中與他在學術上多次深度論戰, 同時也是社會運動的關懷

<sup>25</sup> 法文為:「*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 sociale*」是 1975 年, 透過布勞岱 (F. Braudel) 的支持, 布迪厄成立這個期刊, 也擔任主編直至他去世為止。期刊裡面的文章大致以布氏本人以及他的學生的研究成果為主。

<sup>26</sup> 在布迪厄於 1964 年進「巴黎高等實踐學院 (EPHE) 服務時, 他就在「*Éditions de Minuit*」出版社開始主編了一套叢書《常識》(*le sens commun*)。在這套叢書中, 布迪厄出版了好幾本他的書, 以及他學生輩的研究, 這有助於傳播他的思想。另外也出版了幾本經典的著作, 如涂爾幹與牟斯的作品。最後也引界了法國學界原本較不熟悉的美國社會學家, 如高夫曼 (E. Goffman) 的譯書。

<sup>27</sup> 成立於 1996 年, 本出版社透過「*Seuil*」出版社進行銷售。到現在, 已經陸續出了不少的專書 (可以參照 <http://www.homme-moderne.org/raisonsdagir-editions/index.html>), 而布迪厄的《論電視》(*Sur la télévision*) (1996)、《防火牆》(*Contre-feux*) (1998) 《防火牆二》(2001) 還有逝世之後的《自我分析之素描》(*Esquisse pour une auto-analyse*) (2004) 都由這個出版社所出。

者：杜蘭（Alian Touraine）。年紀比布迪厄還要大的杜蘭（1925-），在聽到布迪厄去世的噩耗，也為之震驚。在哀悼與懷念之餘，杜蘭承認這位學人的貢獻，並肯定他的研究與觀點是他杜蘭「不可或缺的參照座標」（*référence indispensable*）。以當時同等輩份、重要性與代表性的社會學家來對布迪厄做一個紀念與遺憾與肯定，是法國媒體界對於偉大的思想家一種專業的尊重。這是臺灣社會可以學習與借鏡的。

學院味更重的《世界報》的報導版面反而沒有《解放報》多，佔據著頭版的右上方約略三分之一頁的篇幅，《世界報》的文筆顯然不像《解放報》的記者這麼巧思，只選擇一個素樸的抬頭：「皮耶埃·布迪厄去世」（*Pierre Bourdieu est mort*）。標題下面兩行說明「法蘭西學院教授，這位哲學家星期三去世。他世界知名，而其批判的社會學亦伴隨對社會運動的支持。」<sup>28</sup> 一張不大不小的肖像兩旁一些文字，大致介紹這位學者的生平與職務、貢獻、著作。另外，第 29、30 頁還有特別的報導。相對於《解放報》而言，關於布迪厄的死訊在《世界報》整個版面的編排以及篇幅的給予寒酸許多。也讓讀者較不易感受到這位思想家的重要性以及對於社會的貢獻。翻到後面兩頁的報導中，仍舊看到新聞強調布迪厄「學術知識與社會參與」兩兼顧的特徵。在題為「皮耶埃·布迪厄，各種戰鬥的社會學家」（*le sociologue de tous les combats*）的專欄文章中，記者提及這位社會學家繼承法國的傳統（從左拉到沙特），此即知識份子參與到公共辯論的當中；同時也引用布迪厄的學術、社會使命「讓知識從學術殿堂中走出去」（*faire sortir les saviors de la cité savante*），進而使用堅實基礎的理論來認識與改變當代世界。

<sup>28</sup> 原文為：「Professeur au Collège de France, le philosophe est décédé mercredi. Mondialement reconnue, sa sociologie critique s'accompagnait d'un engagement aux côtés des mouvements sociaux.」





接下來的第三十頁版面，則介紹幾個布迪厄的關懷主題：假知識、知識份子、左派的左派以及反全球化。裡面摘要布迪厄生平的演講實錄，分別是摘自頗具代表性的法蘭西學院演講稿、紀念傅柯去世之發表言論、《世界報》專欄採訪稿以及他參與社會運動時的聲明文章。就在這全版面都是布迪厄原汁原味的版面中，右上角卻嵌進一則知名哲學家德西達（J. Derrida）的悼念文章。裡面提及他自從 1948 年於「路易大帝」高中（Louis le Grand）即與布迪厄結識，爾後一同進高等師範學院、一起討論學問、哲學、思想；以及再一起到阿爾及利亞服役。即使後來布迪厄轉進社會學以及在學術見解上與他有齟齬，但他們的交情、互動仍舊相當親密良好。德西達對這位社會學家的評價是「當代社會學在世界上一位偉大及具有原創思維的人物」（*C'était, dans le monde entier, une grande et originale figure de la sociologie contemporaine.*）面對九〇年代中期以降布迪厄積極參與社會運動與改革，雖然德西達有著不同的姿態，不過這位社會學家的消失，使這位解構大師「失去一位不可取代的朋友與見證人。」<sup>29</sup>（*Mais je perds un témoin et un ami irremplaçable.*）

而《費加洛》的報導與上述兩報比起來，則又更形單薄。頭版中只有左上角一小隅交代布迪厄辭世<sup>30</sup>（一旁陪襯的是關於巴黎西郊 Boulogne 森林公園的新聞）；翻到第 12,13 版面的特別報導，

<sup>29</sup> 在《解放報》第四頁的版面中有一張這兩位思想家合影的親密照片。而正當布迪厄去世那一陣子，筆者有幸在巴黎高等社科院旁聽德西達的課，德西達在布迪厄去世後的那週上課，在課堂一開始即提出「最近，我感受到一個很大的悲傷，就是我們的好朋友布迪厄去世了。」隨即，拿出布迪厄一篇文章，當場朗誦兩、三分鐘，以作為紀念。

<sup>30</sup> 其題為「皮耶埃布迪厄：哲學家昨日去世」（Pierre Bourdieu. Ce que laisse le philosophe mort hier.）

發現此報編輯的規劃是請兩位記者描述布迪厄的「學術—社會」參與；<sup>31</sup> 另外一半的篇幅則是摘要對三位哲學家的訪問稿中，對於布迪厄現象的觀點。總占一頁又四分之一的篇幅，還比《世界報》給的空間要少。在對三位哲學家<sup>32</sup> 的訪問中，記者詢問的問題例如：「布迪厄為何會有像今日的名氣？」「布迪厄的創新在哪裡？」「布迪厄是否做到『完全知識份子』（intelletuel total）？」「布迪厄種種社會參與（論電視、反全球化）是否發揮效力？」而大多數的回答則是給予布迪厄肯定的評價，包含他將眾所周知的事物「理論化」（théoriser sur le déjà connu）、認為他成功地社會參與、包含晚近的一些書籍也很有社會實踐性（如《論電視》）。不過，也有學者質疑他理論的特徵是否僵化了既有的社會現象，看不到未來世界可以改變的可能；或者質疑他的革命性。總之，我們看到本報一種持平的報導，並沒有一面倒地歌功頌德布迪厄的學術思維與社會貢獻。有趣的是本報的記載中，將布迪厄稱為「哲學家」（philosophe），而在專欄中所摘要的他人評價，也是放進哲學家對他的評論。雖然文章中有提及社會學，不過本報的基調是將布迪厄列為「哲學家／思想家」來看。

#### 四、總結：反省的開始、觀察文化現象的啓發

從「社會學是種戰鬥的運動」紀錄片，到布迪厄去世之後媒體對這位社會學家的禮遇，<sup>33</sup> 我們看到一個法國完整的綜合文化現象

<sup>31</sup> 其中一篇文章即題名為：「知識份子與積極參與（戰鬥）的腳蹤（旅程）」（Un itinéraire intellectuel et militant）

<sup>32</sup> 此三人乃：「Esprit」（精神）期刊編輯 Joël Romain、評論家 Gilles Lipovetsky 以及巴黎大學第八分校教授、托洛斯基主義者 Daniel Bensaïd。

<sup>33</sup> 必須補充的是，布迪厄的死訊在 2002 年 1 月 25 日報紙的報導以前，1 月 24







(社會／媒體／學術／文化)。而更令文化觀察者關懷的應該會是，在這個現象介紹完之後所帶給我們的省思：布迪厄其人的學術風格與社會參與，社會對他的回應與待遇，對我們臺灣社會可以有怎樣的啟發？以下我們整理三項，盼能在臺灣（社會科）學界拋磚引玉：

### （一）臺灣的媒體

臺灣的媒體以及整個社會，對於我們社會中類似的人物去世的反應如何？我們社會中亦有在藝文界或學術研究界卓有貢獻的人，但當這些人辭世的時候，我們以怎樣的方式在哀悼、紀念，這可以反映出我們這個社會的深度、文化。也就是說，在臺灣哪一種人物過世，會享有報紙頭版全版面的「待遇」呢？本文不列舉經濟上或政治上有影響力的人辭世作為假想情境，是因為這些人在臺灣已享有夠多的關注，而臺灣對政治層面的關懷，也已經動員了夠多的社會資源與成本。但是如果臺灣願意走向多元價值的社會，那麼在其他領域上有貢獻的人的評價狀況，是應該要被反省了。<sup>34</sup>

### （二）臺灣的社會學

布迪厄社會學中，社會實踐的使命與意義，讓我們反省臺灣這塊土地吸收了「舶來品」社會學幾十年之後，「實踐」在社會上

---

日即在各大電視台的晚間新聞報出，有些電視台甚至是以頭條播出，時間長達數分鐘。而更早的訊息則是廣播電台是在當天的下午兩三點間，即已經在播放這個消息。繼新聞媒體的報導，諸文化電台也隨即設計一系列的緬懷（Hommage）、哀悼的節目（如「法國文化台」（France Culture））；各重要學術期刊也在布迪厄逝世起一個月到一年間，出了特刊報導、介紹布迪厄的一生及其畢生貢獻。如 *Sciences humaines* 在 2002 年出了一期特別號。

<sup>34</sup> 寶島歌王洪一峰於 2010/2/24 辭世，臺灣作家葉石濤於 2008/12/11 撒手，這兩位在臺灣文藝界卓有貢獻，亦具時代性意義的「文藝人」，我們的媒體與社會如何紀念他們？

的狀況。如果說對布迪厄來說，學術只有透過社會參與才是真正的「社會學」（因為它是一種戰鬥的運動），那麼在臺灣開展出來的社會學，對這個社會的貢獻將會是什麼呢？我們在臺灣社會學界奮鬥的「同仁」們，應該要嚴守份際地站在學術象牙塔之爭中就好，還是在每個的社會事件有其參與的「天職」？社會學家作為同時也是市民的一份子，該以怎樣的姿態來介入「公民社會」的討論與決策呢？他該扮演怎樣的角色？<sup>35</sup>

### （三）臺灣的社會

在法國的媒體與學術、文化刊物中，我們見到了社會學家布迪厄被「禮遇」的情形。社會學家參與法國社會，而整個社會尊重社會學家作為「參與的知識份子」，以及借用他的觀點思考中央政策。那麼臺灣呢？臺灣如何「使用」社會學與社會學家？社會學家的專業見解可以提供給臺灣社會作為重要的參考嗎？可以如同紀登斯（A. Giddens）提倡的「第三條路」成為當時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的重要政策，還是只能蹙縮在學術象牙塔中做做研究、教教書呢？這其實是臺灣整體社會可以一同思考的。

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布迪厄做出一個不錯的、值得啟發我們的模式／榜樣。布迪厄認為「社會學是種戰鬥的運動」，這樣的想法在臺灣可以被同意嗎？當我們臺灣社會也出現很多的公眾議題<sup>36</sup>待我們解決的時候，臺灣社會學家將被賦予或被期待怎樣的任務？他們在做什麼？

<sup>35</sup> 社會學三大家的馬克思與韋伯讓我們看到兩種典範，社會實踐以及「免於價值判斷」，而社會學這門實踐性極強的學問，可以在臺灣社會中怎樣開展，確實是個極重要的問題

<sup>36</sup> 就在筆者寫作此文之時，「林益世」事件仍在偵察中，循環不已的瘦肉精、塑化劑、工業污染、房地產飆漲等社會問題亦兵臨城下，臺灣社會學可以「怎麼」？或者是否「應該」出來戰鬥？

